

后勤、统战工作两不误的洪学智

洪学智同志在长征途中,先后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负责后方收容和后勤保障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周密组织,率领部队战胜艰难险阻,不仅保障了红四方面军的粮草供应,还先后4次为中央纵队送去粮食、牛羊等物资,受到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同志的高度赞扬。特别是在瞻化期间,洪学智认真执行我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做好统战工作,不仅圆满解决了红军的后勤供给问题,还和藏族同胞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继续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在占领瞻化时,与2000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了土司武装几百人,后经教育后释放。一些群众找到红军,说有些红军缴获的枪支和牛羊是他们的。红军当即归还。当地有一个“万户头人”叫巴顿多吉,听到这些消息后就派人来说,要和红军谈判。其原因是当时巴顿多吉扣留了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国民党民族委员会委员”、喇嘛首领诺那。不久前,巴顿多吉发现诺那携带武器和财产通过瞻化,就把他扣押了。但巴顿多吉发现诺那的身份后觉得左右为难,所以就想把诺那推给红军。

红军经过研究,决定派民运部长周干民去同巴顿多吉谈判。巴顿多吉虽然也想谈判,但又摸不清红军的心意,只好一边答应谈判,一边在谈判的山头上布置人手,以防不测。

为了不产生误会,周干民穿着便衣,不带武器,一个人从容来到谈判地点。巴顿多吉消除了顾虑,对周干民说,只要红军的部队不打他们,愿意为红军提供粮食,并提出诺那交给红军处理。周干民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还请他两天后到瞻化城去见红军最大的“头人”。

两天后,巴顿多吉来到瞻化城,见到了洪学智。洪学智和他讲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洪学智身边有一台留声机,为了增加友好气氛,就放唱片给巴顿多吉听。巴顿多吉觉得非常新奇,洪学智给他讲了留声机的原理,还把留声机送给他作纪念。中午,洪学智还请巴顿多吉吃饭。但巴顿多吉并没有完全消除戒心,不敢放心吃喝。洪学智就先喝了一杯酒,又每个菜都吃几口。这个举动让巴顿多吉解除了戒心,并和洪学智推杯换盏。两个人感情越来越近,最后交杯喝了鸡血酒。席间,洪学智提出,红军可以接收诺那,但要把诺那的徒弟海正涛同时释放,此外还请巴顿多吉出面为红军筹措粮草。巴顿多吉非常满意,立

即通知他管辖的寺庙,不准反对红军,并要求寺院主动捐献牛羊和粮食。几天后,巴顿多吉把诺那移交红军。洪学智发现诺那的马还被巴顿多吉扣着。为了照顾高龄的诺那,洪学智又去派人交涉,为诺那要回了马匹。

不久,红军在瞻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洪学智等请巴顿多吉出任瞻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瞻化地区其他的藏族上层人物在巴顿多吉的影响下,也开始对红军表示友好,为红军提供了大批粮草。

两个月后,萧克等率红六军团到瞻化与红四军会师。这时洪学智和巴顿多吉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在巴顿多吉的帮助下,洪学智等组织2000多名少数民族群众在道路两旁欢迎,并给红六军团准备了6驮食盐和10天的粮食,还有鞋子、帐篷等物品。

洪学智又把诺那送到甘孜,建议让诺那当革命委员会主任。但诺那不幸在一个多月后圆寂了。国民党趁机造谣说诺那是被红军杀害的。其弟子海正涛回到上海后,特地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后来洪学智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亲眼看到了这篇文章。

(据人民政协网)

对曹禺影响深远的地下党员

戏剧家曹禺回忆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的往事时曾说过:“在创作《雷雨》之前,我只是间接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人,我也接触过的”。学生时代的曹禺,此后对同学中一位叫郭中鉴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直念念不忘……

《曹禺同志谈剧作》中记载:“在学生时代,有几件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些关系……再一件,就是在初中三年级时的一个同班同学给我的影响。他的名字叫郭中鉴,平常不苟言笑,但他使人感到亲切、诚恳。他当过我们的班长,说起话来便滔滔不绝。那时我很小,不太懂得他讲的道理。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成熟了的‘大人’,不平凡的。有时,我从他身旁偷偷望一下他记的老师讲课的笔记,那字迹写得十分挺秀,整齐得惊人。他是我们班上课最好的学生。到‘高一’下学期、春天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我读‘高二’时,他被捕了。听说北洋军阀严刑拷问他时,他表现得很坚强,一直不屈。这个人没有对我说过几句话,但他影响了我。那时已经听说,这种人叫做共产党,我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这一种不怕强权、不顾生死、决心要改变社会的人。”

曹禺在《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一文中说:“最影响我的人是一个南开中学同学,四川人,叫郭中鉴,个子不高,瘦瘦的、黑黑的,功课品行,全班第一,我们举他当班长。他沉默寡言,说话行事,非常中肯。听说,一天,他忽然在校

外被特务抓起来了,从此再也见不着他。和我比较接近的同学说,他就是共产党员。在军阀的牢狱里,他始终不屈,在法庭上,他奔上前愤怒地用手铐向法官击去!在1927年北伐时被军阀枪杀了。他使我永远记住,现在还是忘不了他那沉默中的英气。”

《曹禺早期改译剧本及创作》一书中所收的《访曹禺先生记》称:“我在高三时,共产党员郭中鉴死的时候我很佩服。张致祥跟我住对脸,郭中鉴住我旁边。”

2000年版《简明曹禺词典》中,列有郭中鉴辞条,内容均据曹禺回忆而来,但称之生卒年不详。

郭中鉴确有其人。1927年10月《南中周刊》第30期《双十专号》载,9月24日,郭中鉴等在南开同学会奉天同乡对日外交后援会上发表演说,“措词均极沉痛”,满场观众非常激动。10月4日,南开学生会举行第五届代表大会,“组织反日运动委员会。委员十人,全校同学均有被选举权。选举结果:管亚强(即张致祥)、万家宝、张廷勋、郭中鉴……”郭中鉴还参与《南中周刊》的编辑工作。10月7日,新成立的该刊出版版“在校务会议室开首次编辑会议,由郭中鉴主持”。

曹禺时名万家宝。那么,曹禺所说的这位名叫郭中鉴的同学,是见诸史载的党史人物郭宗鉴烈士(1906-1935)吗?

较早记载郭宗鉴生平的文章《永

不消逝的长虹——记郭宗鉴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历史教学》1980年第5期)载,“郭宗鉴(中坚)烈士是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人之一”。并称:1925年他在南开中学高中读书时,组织文学会并负责出版股工作,北伐战争前夕,党组织推荐他到黄埔学校学习军事,其间入党,回津后,任顺直省委秘书、秘书长兼锄奸队长。

郭宗鉴的狱友司呈祥在《郭宗鉴同志在狱中》一文中称,“郭宗鉴,又名鉴秋,四川省长寿县郭家湾人。早年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8年时,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彭真年谱(1902-1997)》、《彭真传略》记载,1929年2月19日,天津当局呈报南京政府行政院的《计抄呈被抓共产党姓名证据一件》中,列有“毛公(傅茂公)和郭中见(宗鉴)”等顺直省委负责人。1929年6月,郭宗鉴因处决叛徒,事发被捕。1929年6月15日《益世报》刊《津市破获大批共产党》,其中载有“共产党名单”20人,包括:“郭宗鉴,二十四,湖北,特务股员……傅茂公,二十七,山西,第三区区委委员”。傅茂公即彭真。

高承志(1926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比郭宗鉴低两级,他和唐锡朝(唐明照)、章功叙(靳以之弟)等,曾受郭宗鉴同班同学张廷勋(张伯训)委托,参与营救工作。高承志在《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人——郭宗鉴烈士》中称,郭宗鉴是1927年“南开”学

潮带头人之一。郭宗鉴因之“被开除后,曾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此后他便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郭宗鉴被捕后,被关押在设于天津的河北省第三监狱。《大公报》载文称郭宗鉴“在审讯时曾举起手铐要打警官”。司呈祥回忆称,郭宗鉴“能言善辩,在过堂时经常和法官展开辩论。有一次,法官强词夺理,郭冒了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向法官掷去”。

郭宗鉴被天津高等法院判处“两个无期加九年零十一个月的徒刑”后,“毫无悲观消极情绪,言谈开朗,亲切和善”,并与彭真等人领导狱中斗争,组织“罢食运动”。董振修在《坚贞不屈的优秀党员——记革命烈士郭宗鉴》一文中也记述过,郭宗鉴后被转押至北平监狱,1935年牺牲于陆军监狱中,时年29岁。

总之,曹禺在回忆中提及的地下党员郭中鉴与见诸史载的地下党员郭宗鉴生平有很多交集。笔者判断,郭中鉴即郭宗鉴。曹禺与之接触后,对共产党的认识日益加深,思想日趋进步。这对曹禺此后的戏剧创作生涯具有深远且潜移默化的影响。

鉴于曹禺研究者尚未将郭中鉴与郭宗鉴联系起来加以探析,加之曹禺对其牺牲时间等回忆有误,因此,对于关涉曹禺早年成长轨迹和创作生平脉络的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值得深入研究。(王勇则)